

中國首任欽差外交大使蒲安臣 史述

舊金山市南二十多哩，有個美麗的海邊小城百靈錦(Burlingame)，現在也遠不算大，只有幾萬人口，想來百多年前建立的時候，更比今天小得多。為甚麼取這個名字呢？說起來，地方小，來頭卻不小，是為紀念近代中西外交史上一個特出人物：中國的首任欽差外交特使，卻是個美國人。

此公的官諱是蒲安臣(Anson Burlingame, 1820-1870)於1820年十一月十四日，生在紐約州新柏林(New Berlin, NY)。1846年，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，繼在波士頓執業律師，以能言善辯著名。1853年，當選為麻薩諸塞州參議員。

1855至1861年，蒲安臣三度連任國會眾議員(共和黨)。他基於聖經立場，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堅決主張廢除奴役，所以竭力支持林肯，為競選熱心，不畏人的反對。林肯就任總統(當年的譯銜是“伯令璽登德”)，任命他為駐奧地利公使；但因他曾在國會講演，贊成匈牙利革命脫離奧匈帝國獨立，奧國因此以蒲安臣為不受歡迎人物，拒絕接受。這樣，1861年六月十四日，林肯總統任命蒲安臣為駐華公使。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。

在華盛頓的時候，有機會見到英，德，法，俄等強國的外交使節，蒲安臣同他們建立友誼，是以後“互惠原則”的基礎，他反對向中國使用武力，反對擴張租界割據領土的政策。

1862年七月二十日，美國公使蒲安臣，為清廷接納入駐北京，是第一批獲准居住京畿的洋人外交代表。

蒲安臣抵任以後，不僅主張採取公義外交，並建議中國發展礦冶，延請美國礦採專家，探測煤礦蘊藏。他託由丁韞良(W.A.P. Martin, D.D.)翻譯惠敦(Henry Wheaton)的國際法初階(*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*)，由政府出資印刷，頒行為教材，以啟迪當時人的世界意識。1865年，他協助籌鋪海底電纜，使電報通訊由廣州至天津；也是他同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(Robert Hart)，贊助設立同文館，以造就外文人才。

他出身新英格蘭世家，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，表現於行為。他身材魁梧，儀表堂皇，而且風度優雅，口才極能動人，又平易善與人交，獲得外交圈的敬愛，和地主國的歡迎信任。

那時的中國滿清政府，經過連年內憂外患：鴉片戰爭失敗；英法聯軍陷北京，咸豐皇帝倉皇逃難熱河；俄國侵邊等，無不以蒙羞賠款失地為結論，敝弱盡露。洪楊之亂，演成太平天國，持續了十五年，蔓延十多省，鬧得筋疲力盡，才於1864年平息。清廷終於漸漸覺醒，以為“制夷”既然不能，不如改而“撫夷”。又覺得洋人已經洞悉中國虛實，中國對洋人卻懼

然不知，以力以理都不能勝人，益感派人出使外國的重要。經徵求封疆重臣曾國藩，李鴻章等的意見，也都以為當行。

但問題在派誰呢？

通洋務的人才既少，有的資望不孚，並且有滿漢種族的考慮，政治的矛盾，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應對禮儀，特別是叩頭的問題，跟洋人交往該如何應付？想來想去，竟然乏人可差！

那時，適美國公使蒲安臣卸任，總理衙門設筵歡送他歸國。席間談話中，主人恭親王奕訢說了一句：“希望閣下能夠作代表我國官方和非官方的特使，訪問各條約國。”他以為那是善意的好話，依唯致謝，酬錯之間，也就過去了。想不到，幾天後，恭親王轉託英使館中文秘書懇切抒意；蒲安臣十分驚奇，經過審慎考慮，表示接受。

當時，精明的英國公使阿禮國爵士(Rutherford Alcock)，由衷的稱讚說：“對於任何人，這是最高的榮譽；只有他當之無愧。”

這樣，一切棘手問題都解決了。但對於真誠和任事認真的蒲安臣，是困難的開始。他是個理想主義者，滿腔福音使者的熱誠；但弱國外交，折衝樽俎，已經夠困難的，而所代表的清廷，倨傲無知，還以唯一文明國家自居；如何能不損中國尊嚴，並自己聲譽？注定前途十分艱難。

1867年(同治六年)十一月二十七日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奕訢全付儀仗，隆重的親臨美國使館，雙手高捧著黃絹匣，中有黃絹御旨，蓋硃紅玉璽，是蒲安臣的正式任命。

蒲安臣權充中外交涉事務大臣(年俸8,000英磅，所有開支在外)，以欽差榮耀身分，率三十人的代表團出使，其中包括：英國駐華使館官員柏卓安，曾任職海關的法人德善，二人為左右協理；另派記名海關道滿人志剛，禮部郎中漢人孫家谷，各加二品頂戴輔助；隨員中還有同文館學生六人，聲勢浩大。

依現在的人看來，似乎有些奇怪；但在那時，海關總稅務司早就是英人赫德，英人高登(Charles George Gordon)的“常勝軍”，在平洪楊的戰爭中，也曾有過卓越的貢獻。現在，外交上任用洋人，有何不可？

1868年二月二十五日，洋欽差大人，率使團自上海乘輪船出發。

五月，抵達舊金山。加利福尼亞州長設宴盛大歡迎，稱讚“最年輕政府的兒子，作最古老國家的代表。”蒲安臣興奮的說：中國已經走上了開放，與各國和平相處並進步的道路。

離開舊金山，蒲安臣代表團乘船遶南美於六月二日抵華盛頓。次日，與國務卿席華德(William H.Seward)會晤。六月六日，拜會總統約翰生(Andrew Johnson)，欣然隆重接見。

在紐約的時候，蒲安臣代表中國，樂觀的宣告：將來兩國人民，可以自由彼此往來，互通貿易，中國將接受美國光輝的文化，並“將光耀的十字架，遍插山嶺谿谷。”

七月二十八日，蒲安臣代表中國，與美國國務卿席華德簽訂“中美續增條約”，通稱“蒲安臣條約”，條文說明：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持不干涉政策，規定兩國互派使節，華人勞工往美國，保證彼此人民可在對方居住，傳教，和留學，並歸化為公民等。這似乎是那時代唯一的平等條約。清廷上下對聲明“不干涉中國內政”條款，特別贊賞，對該約的合法性未加以否認。不過，後來的執行，才是真正的問題。目光短淺的政客，懷有種族歧視，每予阻難限制。

在美國的外交活動，十分順利完成，蒲安臣一行歡然登船往歐洲。

九月十九日，抵達倫敦。十月二十日，在溫莎宮獲維多利亞女王接見。在十二月底，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克萊蘭頓(Lord George William Fredrick Clarendon)，蒲安臣提出“互惠政策”，英方原則上同意，不施行壓迫中國進步，不違背其意願與獨立安全；中國當履行條約義務；英國只在僑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，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。

1869年一月二日，蒲安臣等到達普法戰爭威脅下的巴黎。法皇拿破崙第三(Napoleon III)接見代表團，表明與英國的立場相同。代表團在法國期間，受到良好的外交待遇，但沒有具體協議。

至德國，會見鐵血宰相俾士麥(Prince Otto von Bismarck)。俾士麥對中國頗有好感，當時德國統一尚待穩定，因應歐洲複雜問題，不暇東顧，發表聲明：願完全尊重中國意願，彼此交往。

此後其餘的時間，遊歷瑞典，丹麥，荷蘭等國，因為沒有修約和棘手的交涉，使團有一段安適悠閒。

1870年二月一日，到達俄國。在聖彼得堡，於二月十六日，獲沙皇亞力山大二世(Aleksandr Nikolayevich, 1818-1881)接見。其人想作偉大的歷史人物，而不是偉大的人；在國內有日益高漲的“人民意願”組織反對，致力對外擴張：既蹙於歐洲，就侵略軟弱的中國。他避免談及中俄疆界糾紛，而大言美俄關係，真正“不著邊際”，使代表清廷的蒲安臣大為尷尬。勞頓加上冒寒犯冷，次日就病倒了，診斷為急性肺炎。他仍然扶病看報紙，注意俄國局勢的發展，日夜焦慮，病勢日增，終於不起。在一週後，薨逝於聖彼得堡。

據同行的志剛記述：“蒲使為人明白豪爽，辦事公平，而心志未免過高，不肯俯而就人。一遇阻礙，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；兼有水陸奔馳，不無勞瘁，受病已深，遂捐軀於異國。”真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志剛等於其薨逝後，即給遺屬銀六千兩治喪。清廷為酬庸其“為國效力”，並追念其在美國駐華公使任內“和衷商辦”，特“加恩賞給一品銜，並頒卹銀一萬兩。”

使團離俄以後，又繼續訪問比利時，意大利，西班牙等國；然後，於1870年十月十八日，回到北京，總算不辱使命。

1871年，清廷在英國和法國分別設立公使館，作為正式外交代表。至1878年，駐美國使館也成立。

不過，美國歧視華人的逆流，並未消弭。1880年，國會通過限制華人移民的法令，以道德和廉正知名的海宜斯總統(Rutherford B. Hayes, 1822-1893,在任 1877-1881)堅持履行蒲安臣條約，予以否決。但以後的克里夫蘭總統(Grover Cleveland)和海利生總統(Benjamin Harrison)，並他們的下屬，初則規定華人離境不得復來，繼則歧視侮辱“華人在文化上不能融合於美國社會，並帶來道德和身體的疾病”，禁止華人移民。

任何事情的初創，都要經過痛苦。在十九世紀，國家主義猖行的時代，對平等外交的觀念，還在遙遠的將來，蒲安臣懷著理想的出使，實在是走在時代的前頭，在溝通中外關係上，有其重大意義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